

阿爸曾是苏木达

阿尼苏

三十七年前的秋天，毕勒古泰山下，阿爸带领师生和村民种下的白杨树已蔚然成林。到了秋季，金黄的叶子片片飘落，阿爸漫步林间，内心激动又宁静。此时，科右中旗西日嘎苏木（相当于乡）三年一度的干部选举大会刚刚结束，阿爸高票当选副苏木达（相当于副乡长）。选举开始前，有人试图暗箱操作，把阿爸调到其他苏木，好让“自己人”当选。西日嘎村大队书记得知这个小道消息后，害怕选举真出问题，带领村里十几个干部一起去旗里找到副旗长（旗相当于县），恳切地说：“如果小呼不能参与选举，不仅我们不答应，村民们更不答应。”

第二年，旗政府下文件，要求划清苏木与苏木之间，村与村之间的边界。阿爸负责划分西日嘎苏木的边界。这片山地草原地广人稀，历史以来，村与村之间界限不明，村民们都想为自己村多争点地盘，纠纷由来已久，以前因为边界问题常发生打架斗殴事件。这项工作牵连广，难度甚大。阿爸和其他苏木的干部，还有苏木内二十几个村子的书记一同商议后，从旗土地局找来二十多年前的地图，决定以此作为依据开展工作。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可具体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

一天，西日嘎村的几个村民把邻村白音温都尔村的一个村民按压在拖拉机车厢内，开进了树林。他们把阿爸叫了过去。领头的是个高大、强壮的汉子，在村里有一定的地位，且与阿爸有旧交。他指着拖拉机对阿爸说：“老弟，你给我好好收拾一下这个人。”阿爸忍着怒气说：“什么叫给你收拾？你们这是在犯法！”领头的不满地说：“把我们刚栽好的树苗全部掀翻了。”被压住的男人说：“现在苏木都划清边界了，那块地已经归我们村了，你们不讲理，就想霸占那块地。”领头提高嗓门，对着他喊：“那块地本来就是我们村的！”被压的男人也喊：“历史上就属于我们村，现在划完了更是！”领头的大喊：“你还把我们村的几头牛扣下了。”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眼看着又要动手，被压的男人拼命挣扎。阿爸知道，这时只讲道理已无法解决问题，好在被压的男人没受伤。阿爸伸出手说：“你们先冷静一下。”领头的男人轻蔑地一笑，把铁一般硬的手搭在阿爸的

肩膀，说：“如果你不行，就把副苏木达的位置让给我吧。”其他人跟着他笑起来。阿爸一米八多的大个头，身材魁梧，但领头的这个男子一米九多，比阿爸还高出半个头，体重二百多斤，更更强壮。他平时做事过于鲁莽、霸道，曾经擅自把一个小偷打到不省人事，也不肯听人劝阻，阿爸渐渐不再与他来往。他经常跟村民们说，他才应该当苏木干部。此刻他死死地捏住了阿爸的肩头。阿爸用力握住他的手腕，把他的手掰了下去，然后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字地说：“西日嘎村和白音温都尔村都归西日嘎苏木管，这事你还没有资格管到我头上，你们现在必须放人！”树林里一下子安静下来，领头的男人悻悻地甩着手，谁也没敢再说什么。

那天，阿爸想了一中午。到了下午，阿爸把两村的干部和当天产生矛盾的所有人召集到苏木会议室，说：“各位老乡，紧挨的两个村子不就是两个兄弟吗？应该相互帮助，彼此包容，不应该反目成仇。”两村的干部同时点头，除了领头的男人，另几个人低头不语。阿爸继续说：“那块地适合放牧，不适合开

垦。政府提倡承认历史，照顾现实。依我看，那块地不如就那样放着，白音温都尔村在那里以放牧为主，如果西日嘎村的牛羊，或者说两村的牛羊相互闯入对方边界，赶出来就行啦，你们看怎么样啊？”阿爸的语气非常温和，但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人们沉默一阵，随即开始鼓掌，领头的男人捧门而出。

阿爸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了好几起因边界产生的矛盾，因此得罪了好些个“刺儿头”，但更多的村民越来越拥护阿爸，那些“刺儿头”始终不敢惹事。阿爸每次给村民们丈量田地、牧场，都做到了公平公正，没有偏袒谁，没有欺负谁，所以村民们从心底里尊重阿爸。

1988年至1990年间，旗政府所在地巴镇和西日嘎村之间开始修砂石路。原来坑坑洼洼的土路快通不了车了，尤其赶上雨雪天气，起起伏伏的山路大坑小坑随处可见，有骑摩托车掉沟里的，有开拖拉机翻车的，有牛车马车陷进泥里的……由于条件所限，交通局下文件，让村民参与义务劳动，大家共同把路修起来。但要具体实施时，苏木领导觉得，号召二十几个村子的劳动力去修路，有相当大的难度。而这指挥、监督修路的重任就落在阿爸身上。阿爸没有推辞。阿爸给村民们开会，说：“修路的目的不仅仅是方便我们去镇上卖米卖牲口，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能畅通无阻地去镇上读书。这是我们的责任。”村民们备受鼓舞。这项工作没有出现领导们担心的问题，相反，村民们铆足了劲干，谁干得好谁就会受到大伙儿的赞誉，谁偷懒谁就会被大伙儿监督，群山里回荡着村民们干活的声音和歌声。

不到三年，宽敞、平坦的砂石路从西日嘎村直通巴镇。我小时候，哥哥经常骑着阿爸的自行车，让我坐到横梁上，沿着砂石路骑上东坡顶上，然后调转车把，向西日嘎村俯冲。哥哥在风中喊：“这可是我们的阿爸带队修的路啊！”

修路期间，西日嘎村开始通电，中心小学却迟迟没供上电。校长多次找相关负责人，但一直得不到解决。那

天，校长再次碰壁，正垂头丧气地走在路上，迎面碰见了阿爸。他向阿爸诉苦，眼泪鼻涕流了一脸，又委屈又可怜。阿爸问：“为什么不供电呢？”校长说：“领导说如果给学校供电的话，变压器就会超负荷工作，很可能爆炸。”那时情况特殊，哪个单位想通电，就得给苏木交一笔钱，苏木用这些钱维护供电耗材。校长继续说：“其实，就想让学校多拿点钱，可学校现在哪有钱啊！”

这事本来不归阿爸管，但阿爸实在看不下去了。那天下班，阿爸特意到中心小学走了一趟。几十个学生在上晚自习，五六个人一组，长条桌拼在一起，中间放一盏油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昏暗的教室里充斥着浓重的煤油味。学生们低头学习，眼睛离书本不到十厘米，当他们抬头时，鼻孔和嘴巴都是黑的。阿爸看着这一幕，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强忍泪水，走出了学校。

第二天，阿爸找到村里的电工问：“变压器真的无法承受吗？”电工把阿爸拉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告诉阿爸，目前点的变压器不仅能供应学校，还能再点一百只四十度的灯泡也没问题。电工反复叮嘱，千万别说是他说的。阿爸随即找相关负责人反映情况，结果两人吵起来了。负责人喊：“变压器万一坏了，爆炸了，死人了，你能负责吗？你能负责得起吗？”阿爸也喊：“二十几个村子的孩子都在中心小学读书，他们还没走出西日嘎前，一个个都视力减退，呼吸道感染，你能负责吗？你负责得起吗？”负责人喊：“那没办法，困难就是困难，你这么同情学生，那就让学校拿钱来！”阿爸说：“我找镇里的明白人看过，变压器完全没问题。”负责人自知理亏，一时间说不过阿爸，恼羞成怒，转身离开，把阿爸告到了旗领导那里。经过调查后，旗领导认为阿爸没有错，支持给学校供电。

几天后一个黑漆漆的晚上，西日嘎村西的中心小学突然从黑暗中亮起来。整个学校的师生们狂喜，他们在灯光下齐声高喊：“电万岁！电万岁！电万岁！”那一夜，师生们兴奋得睡不着觉。他们的喊声传到了西坡上，阿爸站在坡顶，泪水在灯光中闪烁。



黄永玉《捕鲸》一九六一年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藏
选自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版画
丝路——二〇二四上海国际版画展

荷花夫妇

小河水丁

的客厅客人极少，偌大一个广东，只有我岳父岳母妻弟弟妹一家子时常来走走。

不觉过了三年，那天妻弟和弟妹来到我家，弟妹站在荷花跟前看了又看，说：“怎么有老鼠的爪印？要用玻璃护起来好一点。”去年我在荷花下方添设书桌，不小心把画框碰落，玻璃摔破了，当时偷懒，只把碎玻璃清理干净，没去装新玻璃。听到弟妹这么说，第二天我带上荷花，又来到了花鸟街。

快过年了，街边花店堆堆叠叠摆满鲜花，格外芬芳，也格外喜气，唯独画廊外表依旧，静静地守在岔巷入口。但刚走到门前，就见出画廊内部焕然一新，不再像是三年前的景象。满眼荷花荷叶，千姿百态，有的以花为主，有的以叶为主，有的把梗画得那样长，“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要不是角落处还存着少量风水画，我就仿佛乘着游艇进入荷花当中，荡漾开粼粼清波。

那对夫妻正在画画呢，都是画的国画荷花，条幅。太太画的是没骨荷花，一尺多宽，底下垫着底稿，上面正给花瓣着色。先生那幅稍窄一点，以梗为主，叶子边缘绿了一块，残留着筋脉。见到我，夫妻两个好不惊喜。

是2020年的事了。

那天我到花鸟街闲逛，在一条岔巷人口发现一家很小的画廊。进去一瞧，四壁悬挂的，墙脚靠立的，主要是风水画。题目叫做“源远流长”“一帆风顺”“满载而归”“前程似锦”什么的，内容大同小异，少不了朝阳、流水、湖泊、帆船、山峦和树木，太阳象征事业日上，流水象征财源滚滚，湖泊象征聚宝盆，帆船象征财路广，屏峰象征靠山坚，树木象征招财挡灾，如此等等。江门尊商重财，这类作品俗则俗矣，颇受大众欢迎。这家画廊也有少量雅致的作品，其中四幅国画荷花并排挂著，皆是一尺见方，以一朵大花为主，配上一二朵蓄梗荷叶。画得很精细，大的荷叶都有破洞，花瓣上的露珠晶莹剔透，几乎要滚落下来。店主是个清瘦的小伙，戴着眼镜，正在作画，也是作的这个系列。

我就跟他攀谈起来。小伙似乎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即跟人家自学装裱卖画，几个月就摸熟业务，自己开店了。他以装裱为主业，也代人售画，得空写画画荷花。我说：“齐白石原来也是木匠，不是专门学画的。”他立刻逊让说：“不能跟人家比。”我问他，荷花能卖掉不？他苦笑着摇了摇头。唉，疫情闹得这么厉害，街上见不到几个行人，多少店铺关门了，谁还来买画呢？我就担心：“那些画画的怎么维持生计？”他支吾着回答：“那……要看你怎么过呀，干把块钱一个月，人家也能活下来。”

干把块钱，除了吃饭还要买画具……我的心情不禁有几分沉重。四下打量，店堂后边用帘子隔出一间厨房，一个女子在洗碗什么的，弄得叮当响。

1993年，西日嘎苏木选举大会开始前，阿爸突然被调到另一个苏木任副苏木达。有人说，那是因为有人怕阿爸被选上正苏木达。好些人想替阿爸去旗政府反映情况，但阿爸只是一笑了之。到了陌生的地方，阿爸不仅解决了当地老师们工资被拖欠的问题，还给老师们争取到了年终奖金。

那时，阿爸每隔十天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我只要听到摩托车的声音，就会跑出屋子，爬到牛棚顶上，向东望去。在一次次失落中，阿爸会不期而至。

三年后，同样在苏木选举大会开始前，阿爸又一次被调到陌生的苏木，这次他降职成了普通干事。很快，这个苏木的选举大会开始了，但阿爸对当地村民来说是一个陌生人，他刚来，也没来得及为村民们做些什么。选举结束，阿爸不出意料地没被选上。但来参加并监督那次选举的领导里，有一位旗委副书记。她把阿爸叫到会议室仔细询问情况后，语重心长地说：“呼苏木达，抱歉啊，让你吃了这么多年的哑巴亏。您不要担心，我回去后，您等信儿！”不久，阿爸的调令下来了，阿爸被调到了旗纪检委监察局，职务是副局长。

阿爸在西日嘎苏木时，起初是宣传委员兼党委秘书，后来管理后勤兼组织委员和纪检委员，再后来是副苏木达……他的时间被挤得满满当当。那时，国家提倡计划经济，每年过年前，旗粮食部门给一口人发三到五斤的白米白面等细粮。阿爸负责开让村民去旗里取米面的介绍信。二十几个村子，有的村子派一个人来，有的村子派几个人来，有的村子一户户地来找阿爸。阿爸为了让村民们过年都能吃上细粮，忙得连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一年腊月末，额吉正在用旧报纸糊天花板，吊顶是用旧日葵秸秆做的架子。额吉把用面粉做的糰糊，抹在旧报纸上，一遍遍踩上凳子，一张一张地糊天花板。这期间，额吉还要照顾炕上待哺的女儿。中午，阿爸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喝水，有个人就急匆匆找到家里来开介绍信，那个人没有关门，跟着他跑进来一头猪，额吉差点被撞倒。猪在屋子里乱窜，后来跑进厨房，把额吉腌好的一缸咸菜拱破了，从一米多高的缸里淌出一地的咸菜，把额吉心疼坏了。额吉哭着说：“别人要过年，我们也要过年啊。”但额吉无论受到怎样的委屈，始终支持阿爸的工作。

阿爸为西日嘎做了很多事，这些事像原野上的春风一样，温柔地抚摸过群山、树林和河流，然后向天空飘散。但这片沉默的山地草原会记住这些事，那些老一辈的村民们，至今仍管阿爸叫“呼苏木达”。

我的第一本汉语工具书是《四角号码新词典》，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是1963年得到的。那时我在读小学五年级，因为学习成绩在年级里拔尖，受到亲戚、邻居们的赞扬，我的一位远房表哥更是来到家中，把自己进城买来不久的这本词典送给了我。至今词典首页上还写着他的名字——“丁克明”三个字，盖着他的圆形印章。

这本词典的独特之处是三种检字法：四角号码检字法、拼音字母检字法和笔画部首检字法。每个字还标注着注音字母，但没有给出注音字母检字法。所谓四角号码检字法，就是把汉字的笔型分为10类，用0至9十个数字代表，把每个汉字视为一个方块，取其四个角的笔形，按左上、右上、左下、右下的顺序各取一个数字，由四位数字组成一个字的号码，再对这四位数按由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汉字排列，以数查字。比如，字典的第一个字是“主”字，号码为0010，最后一个字为“癸”字，号码为9990。这种检字法，很好地体现了汉字是“方块字”的特点。这本词典有两个独特之处，一是它附录了重要纪念日、节日一览表，在其所列27个纪念日、节日里，有11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孙中山、鲁迅的诞辰、逝世纪念日，还有11个是京汉铁路大罢工、卢沟桥事变、十月革命等革命运动纪念日；二是它附录了汉语拼音字母的手写体，分为大写体和小写体，其形态跟英文有些相像。这种手写体现在几乎见不到了，但我在青少年时期，还是经常用来书写书本首页的签名或送给朋友礼物的赠言的。当时我觉得，这种写法比写方块字更新鲜、更漂亮。拥有这本词典时，我还是小学生，查阅需求和自主学习能力有限，因此使用不是很多，但我很珍惜它，毕竟是我的第一本词典，当时它也吸引了很多同学羡慕的眼光。

1964年上初中后，我很快有了一本《新华字典》。它是新中国第一部称得上“现代字典”的工具书。这本汉语拼音检字法和部首笔画检字法并用的字典是我的新式武器，用得得心应手，一直带在身边。它跟随我回乡下乡教书，上大学读书，回县城工作，进省城、京城工作。我小心爱惜着它，好多年一直包着书皮，至今无一页、无一边角的损伤。

我还有一本1971年修订版《新华字典》。字典的扉页是一段毛主席语录。字典的附录中增加了常用化肥和菌肥、常用化学农药、节气表等内容。该字典有明显的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记。

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登场。它偏重于词语解释，词条丰富，释义准确。手头上现有它的四个版本：1983年重排版、1996年修订版、2015年第6版、2018年第7版。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它一直是我从事文字工作的主要帮手，几乎写每一篇文章都要用到。我总是把它放在办公桌右手最方便取出使用的那个抽屉里。四十年来，它们天天相伴，释疑解难，功不可没。因为每一版都留下了一些眉批，因此新版来了，也舍不得把旧的扔掉，几个版本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现代汉语词典》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同宗兄弟”——新华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新法编排汉语词典》。它的主要内容取自《现代汉语词典》。主要区别在于，它不是从每个词最前面的那个字作为词头去查相关词语，而是反过来，从最后一个字来查相关词语。比如查“恒”字，其它词典只能查“恒”字打头的词，却无法查到以“恒”字收尾的词，这本词典解决了词汇的倒查问题，有其独特作用，我至今还在使用。但可能是因为版权问题吧，该词典只出了一版、发行了一次。不知我手头这本可算是孤本？

从《现代汉语词典》往上数，我还有部1957年出版、1962年印刷的《汉语词典》。它是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国语词典》的删节本，开篇有黎锦熙先生1936年写的长篇序言。它离我们所处的时代比较久远了，很多释义已经过时，大量新鲜词汇没有纳入，我基本上没有作为工具书使用过，可它的身世让我难以忘怀。

那是1966年夏秋之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穿着雨衣雨鞋来到一公里外的邻村，我的小学老师陈国治把我带到他的老师的遗孀家里。在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里，老太太掀开炕席，揭开土坯，从炕洞里掏出这本词典和《金玉录》（即《红楼梦》）《战国策》《黄帝内经》等十几本线装书。当时正值扫“四旧”，老太太把老先生留下的这些旧书深藏起来，才躲过一劫。当时我们怕被人发现，不敢点灯。我和陈老师摸黑翻了翻这些书，陈老师用臂膀碰了我一下，我当即低声说，这些书我都要了，请老人家出个价吧。老太太说要30元，陈老师暗中握了握我的两根手指，我对老太太说，我一个学生还没有挣钱，给你20元吧！老太太也没再计较，20元钱对当时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她，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了（当时东北老家一斤小米1毛钱，一斤白菜3分钱）。我付钱，她收好，我便用来穿雨衣，把这些书包裹严实，捧着书，淋着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回家，所幸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人。第二天天亮才仔细看看，这本词典和十几套线装古籍都保存完好，没有任何缺损。这些都是宝贝啊，

我心里一阵欣喜！若没有对它们的爱，我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是不敢自己走那段漆黑一片、风雨交加的夜路的。

除上述字典词典，我的书橱里还有不少各类文学词典，《中国诗歌大辞典》《全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历代典故辞典》《常用典故词典》《中国古代名句辞典》《历代诗词名句辞典》《万条成语词典》《古今词语新编》《古代爱情诗鉴赏辞典》等。这些词典，都来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不明白，当时自己上有老下有少，生活很拮据，又不是专业搞文学研究的，为什么要花不菲的钱去买它们？应当是“文革”落下文化饥渴症吧，没书没怕了，就见什么买什么。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清冷的星期天早晨，自己在新华书店门前排队购买两卷本《古文观止》的情形。

我收藏的最大部头的词典是商务印书馆1983年修订出版的《辞源》（1—4卷）。它庄重典雅，广纳博收，释义详尽，重在溯源。我信手查了一下对“三”字的释义，共有610个词条，每一条都引据词典，追根溯源，注明其源自哪一典籍、哪一卷次，原话是怎么说的，内涵极其丰富。而《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三”字，只有114个词条，且包含“三产”“三险”“三农”“三通”“三资企业”等十几条改革开放以来的“新词”。当然，两部词典的定位、功能不同，不可简单对比。《辞源》的广度和深度是惊人的，它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汉语的博大精深。要深入研究汉语特别是古代汉语，还真得好好向这部始编于1908年、经过几代人呕心沥血编撰修订的资深大型工具书请教。

而我最有感情的则是一本墨绿色封皮的口袋书——《汉语成语词典》。它本来是我的恩师陈国治老师自己使用的，我在他的班级里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从偏远农村考入县一中后，陈老师把他的这本盖着自己方形印章的小词典送给了我，作为对我的嘉奖和鼓励。我长期把这本小词典带在身边，记念着我的恩师。

这些字典词典，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它们不但是语言文字工具书，也当之无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查阅字典词典，品味词汇的意韵风采，追求文字的精确优美，就是徜徉在积淀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在“日用而不觉”中被熏陶着，感染着，引导着，滋润心田，涵养理念，提高素养，成长进步。这就是蕴含在字典词典中的祖国语言文字的魅力和力量！

为写这篇文章，我搬出了十几本字典词典，放在写字台上翻阅、欣赏。这些工具书里有六十年的演变，保留着我的、我老师的、陈老师的老师的诸多印记。恩师已逝，音容长在。而表兄丁克明，从我1964年上初中以来就再也没见过。由写此文引起思念，我很想回到老家村里去看看他，祝愿他还健康地生活着。

笔会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